

26平方米蜗居里的梦想



王月英的梦想，和中国当代数以亿计的普通百姓一样。为此，这个58岁的单身女人整整奋斗了30年。

在过去的每一天里，她起早贪黑，摆地摊开小店，拼命赚钱；她省吃俭用，多年都没添过一套新衣服；她精打细算，把每一分钱的作用都发挥到极致……所有的努力只有一个目的：尽早离开那个只有26平方米、连转个身都困难的蜗居，拥有一个宽敞的家。

10年前，她倾其所有为儿子支付了婚房的首付。她的想法很纯粹，只要儿子能住出去，只要以后孙子能在在一个健康完整的家里长大，自己大半辈子的辛苦就是值得的。

她几乎已经肯定，自己的余生还要继续留在这个让人委屈的地方。

她做梦也没想到，10年后，宁波启动了大规模的成片危旧住宅区改造，她所在的江北孔浦二村被列入了改造，因此受益。

26平方米的危旧房，置换成了58平方米的电梯房。她的新家，就在原来小区一条马路之隔的新建11层高楼里。1月初，王月英已通过抽签拿到了新居钥匙。梦想来得太快，这似乎还是一个梦。

记者 樊卓婧 程 鑫
实习生 傅佳璐



抽签结束后，王月英欣喜地展示抽签公证书。

记者 王鹏 摄

同一屋檐下，已非一家人

在江北孔浦二村，王月英的房子是居民楼里最小的，只有26平方米。

原来的户型并非这样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这片小区刚落成的时候，那是间61平方米的二居室。当时，一切都是崭新的，在周围低矮的平房中，这幢居民楼是那一带最显眼的建筑。小区门口的大庆北路不像现在那样灰头土脸尘土飞扬，那是一个热闹的街区，车水马龙应有尽有……

王月英记得很清楚，她是1984年搬进的。那年她27岁，是骄傲的国营厂工人，丈夫在渔业公司上班，工资高、福利好，这个当时在宁波屈指可数的小区，也是公司给员工的福利。她还记得分到房子时一家人欢天喜地的情景，虽然产权还是单位的，但每月只需要付很少的房租，就可以一直住下去。

工作、房子和家，一切都是那么顺利。

带着3岁的儿子搬进时，王月英怎么也没想到，这让人羡慕的房子和她那曾经以为会维系一生的婚姻一样，无非外表光鲜，实则让人失望。

孔浦这一带的居民楼，和宁波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成的很多老小区一样，由于当时建设设计标准较低，施工工艺落后，使用海砂现象较为普遍，时间一长问题就暴露出来。

楼上的居民最早发现，大车经过时，整幢楼似乎都在轻轻晃动，住得越高这种震感越明显；没几年，有的居民家中开始漏水，天花板和雪白的墙面上布满黄色的水渍，很快霉斑点点，当时的办法是拿挂历或明星海报糊上，但很快海报也霉了；台风来了，暴雨一下，一楼的住户就遭殃了。1989年搬进来的丁大荣说，有时候积水要漫到小腿肚……

所有这些对王月英来说都不算什么，搬进来2年后，她就经历了人生最大的挫折：这个一直以为生活在幸福之中的女人，直到丈夫提出离婚时才发现，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。

经过无数次的争吵、哭泣、纠结、崩溃，最终法院判决他们离婚，孩子的监护权归母亲，房子一人一半。

一人一半的结果就是砌一道墙，把这套他们共同居住留下很多回忆的房子一分而为二，一人住一边。

就这样，她原来61平方米的家变成了26平方米。王月英花了很久才接受这个事实：他们还是住在同一屋檐下，只是，已不再是一家人。



王月英迫不及待在新小区里，看看自己的新房。

26平方米的家

2014年，宁波启动成片危旧住宅区的改造，包括孔浦一村、孔浦二村在内的多个小区名列其中。王月英的这套房，面积之小让上门调查摸排的社区工作人员也倍感惊诧。

30年的光阴冲淡了当初刻骨铭心的爱恨、悲喜，王月英指着厨房对面的那堵墙笑着解释：“那年婚一离，房子就只剩一半了。”

那面墙一砌，两间卧室只剩一间，厨房还在，卫生间却没了。

王月英合计了一下，把房间的前门封了，只从后门进出，这样又腾出来一点空间，勉强可以挤上两张钢丝床——但是，其中一张白天必须收起来，吃饭用的小桌子得放在那里；窗台下再摆张写字桌，桌下堆放着换季的衣物和被子后，这个逼仄的空间几乎连转身都很困难了。

没有卫生间，母子俩白天去10多米开外的一个招待所上厕所，晚上放个痰盂。10多年，王月英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倒痰盂。直到上个世纪末，招待所也拆了。她想了半天，又从厨房隔出不到一平方米的地方，装了个马桶。虽然在马桶边炒菜有点怪，但“慢慢也就习惯了”。

所有的困难都能克服，最让她担心的还是儿子大虎。

封墙的时候，儿子才5岁，他根本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，还像以前一样跑到隔壁他爸爸那里去。但是很快，爸爸的新妻子住进来后，那个还在读幼儿园的孩子一下子理解了大人嘴里的“离婚”。

大虎的童年几乎封闭。他很少出门，因为总有人嘲笑他“爸爸不要你了吧”，或者有好事者追着他问“新妈妈喜欢你吗”，他什么也不说。同学请他去家里玩，他也不去，因为自己家太不像样，没法回请。从小学到初中，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关在房里收音机。

为改变现状，王月英又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，但很快又结束了。

“其实他对孩子也蛮好的，但我没有办法，三个人挤一屋，晚上睡觉中间就挂个帘子，儿子也慢慢大了，总归……”王月英讲这些年的辛酸，说着说着，突然回过神来，“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？”

很久没有人好好听她的委屈了。在过去的30年里，我国对传统的福利分房制度进行变革，逐步实现了住房的商品化和社会化，王月英看着包括前夫在内的很多熟人都相继离开了这里，住进了更大更好的新房，而她，只能带着儿子在这里继续窝着。

“这简直是梦里来的机会。”得知这片危旧房要改造，王月英又燃起了对房子的梦想，“换钱，换房子，都可以。”她对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说。

危旧住宅区改造这项民生工程虽然惠民利民，可在利益纠葛面前也会遭遇各种难题，江北区创新退出“自主+竞争”的模式，通过居民竞争性投票来确定先行改造的区块。王月英是最早投赞同票的居民之一。

摆摊摆出一套房

王月英知道，这张赞成票，把她的梦想拉近了一步。

30年的努力，只为一件事——离开。但在这之前，她还要完成很多更现实的事，比如，把日子过下去，把儿子拉扯大。

第二次婚姻结束后不久，王月英下岗了。

单位、男人，那些她曾经以为可以倚仗一辈子的东西，原来全是靠不住的。那么，只能靠自己了。没有别的技能，好在她为人开朗，做点小生意还是可以的。

早在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，她就开始在夜市摆地摊。早上7点不到，她骑车把儿子送进学校，然后去工厂上班。下午下班后便去和义路，那时候交2元钱，就可以摆一晚上。王月英从望湖市场批发帽子、围巾和一些小饰品，放下国营厂女工的身段，当起了小摊贩。

下岗后，她想去孔浦小商品市场租个摊位，但没本钱，只能一家家的去问，看能不能淘到个便宜点的。

有一回，在和一个摊主聊天时，刚好有人来看围巾。摆了多年地摊的王月英三言两语便说动了顾客，人家几乎没还价就掏了钱。

摊主留下了她：“你帮我看店吧，没风险，又能赚钱，你自己做压力很大的。”

白天看店，晚上去夜市摆摊，一做又是好几年，儿子也渐渐长大，开销越来越大，王月英总觉得，再多的钱也填不满生活张开的嘴。

转眼大虎中专毕业，在银行找到一份工作。就在大家都以为王月英熬出头的时候，他又离开银行去当兵。

她说，这孩子从小到大都听话，什么事情都往心里憋着，也只有这一回这么坚定，当妈的能不支持吗？

那时，也就是本世纪初，一座又一座新楼正拔地而起。王月英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起，公交车上、老旧楼房的天台、街边的灯箱、购物商场的LED大屏幕，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都能看到房地产广告。她开始变得焦虑，孩子长大了，总不能在这26平方米的小屋里娶新娘吧？

她的观念和多数人一样，有房才有家，而居住的环境则决定一家人的生活质量。但看看广告上那些新房的价格，常常会被吓一跳。

有人给她出主意，建议她去城隍庙新街租个摊位，“那里好赚钱，三四元批发来的皮筋，可以卖到20元”。

王月英挺心动的，可一年3.5万元的租金对她来说，太贵了。想了半天，她选择到那里帮人看店。每天从早上10点做到晚上10点，一个月工资700元。她觉得值，“至少可以摸摸那里的行情。”

儿子后来退伍，带回5万元钱，这成了王月英的启动资金。她租了个摊位，自己做起了买卖，几年下来攒下了15万元。2006年，她为儿子付了新房的首付。
(下转06版)



王月英在以前的小房子里收拾物品。